

《基础条约》与两德统一

吴友法

如何看待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1990年10月3日迅速地实现了统一,从当时的情况看,似乎完全是东欧剧变导致的结果。本文认为,东欧剧变只是两个德国实现统一的外部因素,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促成德国的统一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两个德国重新实现统一,应该看成是两国人民的民族情感的再度融合。民族情感是实现两个德国统一的重要内部因素,是推动两个德国实现统一的强大动力;即使没有东欧剧变,两个德国最终也会实现统一。而两德关系由彼此对立、封闭、隔绝状态到友好交往、合作以至两国的民族情感逐渐得以融合,完全得益于两德关系《基础条约》的签订。《基础条约》为改善两德关系和实现两德统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基础条约》促使的在两国人民共同的民族情感维系下的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合作以及要求实现统一的强烈愿望,即使有东欧剧变这一外部条件,两个德国也不可能迅速地实现统一。

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于1990年10月3日奇迹般地迅速实现了统一。乍看起来,促成两德统一是东欧剧变导致的结果。然而,东欧剧变以及当时的苏联和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为适应这一变化对德国统一的支持,都只是促成德国统一的外部因素。诚然,这一外部因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促成德国的统一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实现德国的统一,是早就存在于两个德国的德意志人民心中的夙望,也是两个德国之间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两个德国的重新统一,应该看成是两个德国人民的民族情感的重新融合。因此,民族情感是实现两个德国统一的重要内部因素,是推动两个德国实现统一的强大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德国在美英法和前苏联的操纵下,分别依附于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政治军事集团,在“德国统一”和“柏林问题”上处于严重对峙的局面,两个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因外部因素的撞击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尽管如此,两德的人民并没有放弃民族统一的强烈要求。克服外部因素的压力,医治民族感情的创伤,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便是实现两德重新统一的关键。两德关系的《基础条约》的签订,为改善两德关系和实现两德统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基础条约》打破了两德互相对立、彼此不接触、不往来的封闭局面，从而洞开了缓和两国关系的大门，为两德之间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

在50年代，民主德国致力于争取德国的统一，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地努力。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九国签订了《巴黎协定》和联邦议院对《巴黎协定》的批准，联邦德国获得了真正的主权和独立国家地位，并以“平等成员国”的资格加入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此，德国统一问题就逐渐陷入了僵局，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两个德国存在根本分歧。联邦德国声称“不能以脱离西方范围和放弃欧洲一体化成就为代价来换取德国的重新统一”^①，反对苏联提出的“统一后的德国中立化”的建议，认为德国中立化是迎合了苏联的中欧扩张的需要。鉴于联邦德国的强硬态度，民主德国从70年代后期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旗帜，其宪法规定：“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和维护两个德国正常关系与合作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个民族要求”，主张两个德国之间相互承认，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这一主张一直发展到后来昂纳克提出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民族”，不存在重新统一的问题。而联邦德国一直未放弃统一的主张，只是坚持要求用西方模式统一德国，并希望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把民主德国统一过来。为此，联邦德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哈尔斯坦主义”，拒不承认民主德国，并以谋求增强自身实力和影响、堵塞民主德国活动范围的办法，为统一德国创造条件。1955年9月22日，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作访问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我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联邦政府今后也将把它（指苏联——引者）保持正常关系的第三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视作不友好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适合于加深德国的分裂。”^②此后，联邦德国宣布：联邦政府将与所有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断交；也不同东方集团的国家建交，苏联作为第四个占领国是个例外。这一政策使两个德国关系更趋紧张，终于导致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在苏联的建议下，民主德国于1961年8月开始在东西柏林之间和民主德国其他地区与西柏林之间修筑“柏林墙”。“柏林墙”的构筑，使西柏林成为一座孤岛，堵塞了民主德国人员逃往联邦德国的道路，使柏林局势趋于平稳。“从筑墙那天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③。苏联称“柏林墙”为“和平之墙”^④。“第二次柏林危机”虽然用一道墙解决了，然而影响两国关系的潜在因素并没有得到解决。“柏林墙”的修筑，用封闭的办法给民主德国政治上和经济上带来了暂时的稳定局面，但却为两国人民的交流、往来设置了新的障碍，使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情感又出现了一层新的隔膜。

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戴高乐对美国霸权提出了挑战，欧美矛盾有所发展，美国迅速从战后初期霸权地位的顶峰向下跌落。由于苏联经济、军事实力地位得到加强，拥有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争霸出现了暂时缓和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是寻求在维持德国分裂的情况下与苏联的妥协。“柏林墙”建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国际上承认民主德国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哈尔斯坦主义”显然与这些变化了的现实很不相适应。“从冷战走向缓和的转变，使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立场站不住脚了。”^⑤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联邦德国也希望谋求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不愿充当“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角色。“哈尔斯坦主义”不仅约束了联邦德国在外交上活动范围，影响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同时也使两德关系的大门紧紧关闭。两国之间彼此对立，不接触、不往来，自然也谈不上统一的问题。

联邦德国从当时变化的国际形势及两个德国的现实出发,不得不对其与民主德国对抗方针进行调整,由对抗走向对话,走向缓和。70年代末,勃兰特和他的助手埃贡·巴尔提出了“以接近求转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的思想。勃兰特认为,“既然柏林墙一时推翻不了,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渐变’上”,“历史是运动的,在这过程中,一切都在变”^⑧;“哈尔斯坦主义”不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联邦政府要改善同“东方”的关系,并尽可能使之正常化。于是,勃兰特政府开始抛弃“哈尔斯坦主义”,转而实施“新东方政策”。1969年10月28日,勃兰特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承认民主德国的“现状”和举行互不歧视的谈判。声明说:“德国存在着两个国家”,但“彼此不是互为外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特殊性质的关系”;虽然“联邦政府不能考虑在国际法上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愿意与民主德国进行接触和谈判^⑨。1969年12月18日,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写信给联邦德国总理海涅曼,向联邦德国递交了一份确定两国关系的条约草案^⑩,海涅曼接受了这一建议。随后,勃兰特于1970年1月22日写信给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斯多夫,建议两国就互相放弃武力举行会谈,斯多夫欣然同意。1970年,两国总理勃兰特和斯多夫分别在民主德国的爱尔福特城和联邦德国的卡塞尔城举行了两次会谈。在勃兰特出发赴民主德国之时,联邦德国不少人自动来为他送行。勃兰特到达爱尔福特时,数千民主德国公民聚集在“爱尔福特宾馆”欢迎这位来自联邦德国的总理。强烈的民族情感使勃兰特激动得眼里噙满了泪水。然而,由于国际大背景和两国依附于不同的政治军事集团,巨大的民族情感却解决不了两国面临着还存在严重分歧的政治问题。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斯多夫在爱尔福特会谈中强调:“不是我们分裂了德国,责任完全在联邦共和国和西方大国。因此,要谈论民族的统一,或是要维护民族的统一,是没有基础的。”^⑪他认为德国的分裂已经既成事实,强调联邦德国必须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勃兰特从“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论出发,强调两个德国的特殊关系,要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必须为克服德意志内部的边界铁丝网和墙壁作出贡献”;斯多夫指出,“两个主权国家”,“是不能合而为一的,因为对立的社会制度不能合而为一”^⑫。会谈中,斯多夫提出两国签署包括在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的基础上,双方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国界的不可侵犯性、互不干涉内政等内容的“平等关系条约”。勃兰特从坚持德国统一的原则出发,拒绝了这一旨在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建议,强调两个德国“有责任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不互为外国”。

虽然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两国存在较大的分歧,但都表示愿意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随后,两国又经过了一系列的双边谈判,终于在1972年12月21日正式签订了《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基础条约》(简称《基础条约》)。条约正文由前言和10项条款组成,另外还有一份作为条约附件的《附加议定书》。条约在双边关系问题上明确规定:“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相互之间的正常的睦邻关系”;双方“遵循联合国宪章中确定的目标和原则,特别遵循主权平等、尊重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自决权、维护人权和互不歧视的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双方的争端,“放弃使用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⑬。这些规定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两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从而打破了两国之间相互对立、不接触、不往来的封闭局面,为弥合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感情的创伤创造了条件。《基础条约》的签订,联邦德国也等于实际上承认了民主德国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随后民主德国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西方国家纷纷承认民主德国,同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针对《基础条约》的意义,昂纳克指出,条约的签订,“为按照和平共处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国际法基础”,两国

“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尊重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尊重自决权、保障人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根据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国际法的准则，发展彼此的关系”^②。

《基础条约》的签订，是勃兰特提出的“以接近求转变”策略的具体体现。没有接触，就没有感情上的交流，也就谈不上发展两国的关系，更谈不上两国的统一问题。《基础条约》的签订，为两国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基础条约》为两国之间的往来与合作铺平了道路，使彼此受伤害的民族心理得以弥合，为两德人民的民族情感再度融合创造了条件

德国的分裂，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两国人民不愿看到民族的长期分裂，渴望重新实现民族的统一。然而，由于东西方大国的严重对立，插手德国问题，使德国问题复杂化。它们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出发，都要求按自己的意图和设想来统一德国，以便使新统一的德国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两个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又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彼此间的摩擦纠纷不断发生。因此，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德国统一问题根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在70年代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基础条约》保留了双方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条约指出：“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并不在损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原则问题，其中包括对民族问题的不同观点的情况下”，“本着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合作创造前提条件，以造福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人民。”^③尽管在统一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但并不妨碍两国之间保持正常的关系，这是《基础条约》确定的原则立场，即在保留原则性问题分歧的情况下发展两国关系。条约规定：“双方准备在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来处理实际的和人道方面的问题”；双方将签订协定，“为发展和促进在经济、科学技术、交通、法律交流、邮电、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及其他方面合作”^④；在双方政府所在地“互设常驻代表机构”。这些规定为两国交往铺平了道路。

为便于两国之间的交往，根据《基础条约》第8条，两国于1974年3月14日签署了《联邦德国政府和民主德国政府关于设立常驻代表处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代表处任务是“促进和扩大”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领域的正常的睦邻关系”。根据议定书，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互设常驻代表处，双方各自承认对方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联邦德国坚持两个德国不互为外国，而是“德意志内部的特殊关系”，对民主德国“不予”国际法上的承认；同时根据《基本法》，坚持两德居民都拥有“德意志国籍”，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的双重承认。尽管如此，两国人民撇开政治上的偏见，强烈要求相互进行接触、交往，增强骨肉同胞之间的民族情感。《基础条约》签订之后，隔绝了20多年的民族情感的潜流，象打开的闸门一样，奔涌向前，其势锐不可挡。

《基础条约》使两国关系明显改善，东、西柏林和两国人民之间往来十分频繁，交往人数不断增加。1970年，联邦德国只约有350万人从陆路到西柏林旅行，1975年增加一倍多，同一年有300万以上西柏林人到东柏林和民主德国进行访问。从1970年至1975年，从联邦辖区到民主德国旅行的人数成倍增加，超过300万^⑤。为维系民族情感，鼓励民主德国居民去联邦德国旅行、探亲访问，联邦政府规定给到联邦德国旅行、探亲的民德人每人发给30马克“欢迎金”。《基础条约》签订后，有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得到去联邦德国的“处理紧急家庭事务”的旅行许可证，使不少失散家庭得以重聚。从民主德国到联邦德国的“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的人员”探亲人数从100万上升到130万^⑥。1975年以后，双方交往更加频繁。从1971

年至1979年,联邦德国到民主德国旅行、探亲的达4000万人次,从西柏林到民主德国的近2500万人次;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旅行、探亲的也有1300万人次。为便于联系、沟通信息,《基础条约》签订后两国之间的电话线从34条增加到700条以上,电信畅通无阻。双方记者的工作条件也得到改善,扩大了非商业性的商品交往和行政往来。

除了人员往来不断增加外,两国之间贸易额也迅速发展,经济关系不断加强。1980年双方换货额已达100.87亿联邦德国马克,1986年又增加到142.95亿马克。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贸易占民主德国同西方贸易的40%,成为民主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为加强双边的贸易,联邦德国每年还给民主德国提供巨额“无息透支贷款”。1969年以前每年为2亿联邦德国马克,1969年以后每年为前一年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出口额的25%。1985年9月,两国又签订了新的《无息透支贷款协定》,规定在1986年至1990年间每年最高额为8.5亿联邦德国马克。这些“无息透支贷款”的目的是鼓励民主德国扩大对联邦德国的出口,民主德国在双方贸易结算时出现逆差,可以使用这些“无息透支贷款”。仅此一项,民主德国每年从联邦德国得到数亿马克的好处。至80年代,联邦德国每年以不同形式向民主德国提供各种款项达20多亿马克。两国的经济关系在《基础条约》签订之后越来越密切,联邦德国约有6000至7000家企业和厂商同民主德国有着经济和贸易关系。此外,在科技、文化、交通、邮电、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关系。

两国关系得到这样迅速地发展,得益于《基础条约》的签订。正于昂纳克于1980年7月4日指出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比两国建国之初要好。至于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这是不言自明的。近10年来毕竟是建立了一个条约体系,在国际局势趋于紧张的情况下,这个条约体系和莫斯科条约、华沙条约、关于柏林(西)四方协定和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一起,证明是经得起考验的。”^⑩

三、《基础条约》促使了两国领导人和政治家之间的相互访问, 使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两德统一奠定了基础

两国领导人、政治家之间的互访,是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基础条约》签订之前,除勃兰特和斯多夫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分别在各自国家举行过会谈之外,两国高级领导人和政治家之间没有进行正常的互访和接触。《基础条约》签订之后,虽然两德关系在广泛领域得到改善,但到70年代末并未开始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互访。这一方面固然有两国领导人在“民族问题”和“统一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应该说也是主要原因,因为两国关系的发展还要受到苏联和西方大国的制约。联邦德国一直主张德国重新统一,并且认为只有苏联意识到必须同西方取得谅解的时候,德国统一的机遇才会到来。有鉴于此,1974年施密特上台后,在发展同东方关系的同时,又坚持立足西方,在外交上实现“双轨政策”。虽然民主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坚持“两个民族”的提法,强烈要求联邦德国把民主德国作为外国,承认民主德国的“国籍”^⑪,并且昂纳克在1980年还提出要把波恩和东柏林的“常驻代表”升为“大使”。但是,也应该看到,民主德国领导人并没有抛弃在两德人民之间维系着的“民族共属性”,因而也不断赞成扩大双方人员往来与合作,从而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民族感情的融合,客观上为统一创造了条件。不是他们真正愿意德意志民族长期分裂下去,而是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包袱太沉重了,他们受到外部因素主要是苏联的影响和制约太强烈了。两个德国领导人之间的往来和两个德国的统一,并不完全是两个德国内部的事情,它

受到美苏在欧洲对立和整个东西方形势发展变化的制约。两个德国的关系只是东西方关系这一“大气候”中的“小气候”。两国领导人迟迟没有互访，主要是受外部“大气候”的制约。

由于《基础条约》的签订，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发展和加强，也促使了两国领导人之间互访的愿望，谋求高级领导人之间的接触。80年代初，东西方出现缓和的气氛，联邦德国率先行动，施密特总理于1981年12月首次访问民主德国，并在这次访问中向昂纳克发出了访问联邦德国的邀请。由于美苏在欧洲进行新一轮导弹竞赛，使东西方“气候”趋于紧张，昂纳克访问联邦德国的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实现。1982年10月，科尔出任总理。科尔上台后，将谋求实现德国统一作为政府的重要目标。他在就职时发表的第一个政府声明中强调指出：“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是破裂了，但德意志民族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我们的目标是“重新获得德国的统一”。他在每年的一次政府声明中都要讲德国的统一问题。科尔上台之初，两国关系曾一度处在正常化以来的最低潮。为实现德国的统一，科尔继承了施密特在外交上的“双轨政策”，竭力保持与西方大国、苏联领导人之间广泛的接触，邀请美英法、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访问联邦德国，致力于缓和东西方矛盾。同时，加强与民主德国的关系，除进一步在经济技术上合作之外，邀请昂纳克和辛德曼访问联邦德国。昂纳克又因苏联对联邦德国发动猛烈抨击攻势，在苏联的阻挠下，使已准备很久的访问联邦德国计划又“再度受阻”^⑧。“寒冷的国际大气候”，使昂纳克访问联邦德国的计划被无限期推迟。

尽管两国关系发展受到东西方国际“大气候”的严重制约，但两国毕竟是同一个民族，有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双方都有亲属在对方国家，因此两国人民都有要求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实现德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从施密特访问民主德国后，两国相互交往更加频繁。为促进双方人员的往来，双方政府都提供了方便条件。联邦德国从1987年9月1日起，将民主德国到联邦德国旅行、探亲的“欢迎金”，由每人30马克增加到100马克；民主德国居民在联邦德国乘火车减价50%，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及进出文娱场所，不是免费就是优惠。民主德国也放宽了两个德国间人员往来的限制，颁布了“在紧急家庭事务情况下”到联邦德国旅行的条例，放松探亲的规定，允许民主德国公民移居联邦德国与家人团聚或同外国人结婚；从1989年4月起，民主德国又允许夫妻可以同往联邦德国探望旁系亲戚。1982年至1987年，联邦德国到民主德国旅行、探亲人数达2000多万；民主德国到联邦德国旅行、探亲人数也达1200万。这些都说明，两个国家是在共同的民族情感维系下的两个特殊国家关系。

与此同时，两国政治家也频繁互访、接触。施密特访问民主德国之后，大批联邦德国政治家纷纷访问民主德国。1983年7月和1984年2月，联邦德国执政党之一的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亲自两次访问民主德国，会见了昂纳克，“进一步缓和了两国之间的关系”^⑨，使两国关系走出了科尔上台后的短暂低潮，迈上了大踏步发展时期。除施特劳斯之外，还有埃贡·巴尔、联邦政府财政部长施托尔滕贝格、西柏林市长魏茨泽克，也先后访问了民主德国。仅在1984年3月11日至12日两天时间内，就有80名联邦德国政治家到民主德国访问，被联邦德国报刊形容为“政治朝圣”。对于联邦德国的积极态度，民主德国没有屈服苏联的压力，昂纳克亲自接见来访的重要联邦德国政治家。1984年2月，昂纳克在莫斯科首次会晤科尔，双方进行了非常有益的会谈。在1985年美苏首脑日内瓦会谈后，昂纳克于1986年向联邦德国记者表示希望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这一年的2月，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主席辛德曼应社会民主党的邀请，访问了联邦德国。同一年，昂纳克与科尔在斯德哥尔摩再次会见，并签署了科技合作与人员交流协定，双方还有两县一市结为姊妹城。

随着东西方政治“气候”转暖,在美苏就双方削减中程导弹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后,昂纳克终于在1987年9月对联邦德国进行了访问。在访问中,昂纳克与科尔进行了友好会谈。在双边关系问题上,两国领导人从现实出发,赞成发展和扩大现存关系,一致认为两国经济关系在过去几年里获得了积极的发展,表示继续改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经济合作,赞成继续在较高级别及其他级别的接触。为此,两国签订了科技、环保、核能安全等三个具体协定,并就人员往来、交通、旅行、青年交流、体育、家庭、团聚、边界、新闻、邮政、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赞同继续加深这些方面的合作关系。

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访问,充满了“同胞之谊”,特别是对他的出生地萨尔州的维伯尔斯基兴镇的访问更具感情色彩,“乡亲”情感使他压根儿忘记了在联邦德国政界人士面前坚持的“两个民族”的观点。昂纳克这次访问受到国宾待遇,表明两个德国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也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固有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是实现两国统一的强大动力,为两德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这一动力必将使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变成两个德国人民早已渴望的现实。然而,只要美苏对峙的雅尔塔格局的存在,这种有利于德国统一的缓和局面和机遇就难以到来。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思想抛出后,东西方关系得以缓和,东欧出现政治剧变,雅尔塔格局开始动摇。这一外部因素为德国的统一创造了机遇。科尔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提出了德国统一的主张,并经过不懈地努力,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和苏联的支持,在两个德国从《基础条约》签订以来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及两国人民早就有要求统一的愿望的坚实基础上,才迅速地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如果没有东欧剧变,两个德国最终也会实现统一;如果没有两国人民共同的民族情感维系下的两国之间友好交往和合作以及要求实现统一的愿望,即使有东欧剧变这一外部条件,两个德国也不可能迅速地实现统一。

注 释:

- ①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中译版,第561页。
- ②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二),第57页。
- ③ 库特·宗特海默尔:《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译版,第215页。
- ④⑧⑨⑩⑬⑭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译版,第15、94、479、481、503、503页。
- ⑤⑦ 威廉·格雷韦:《西德外交风云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中译版,第201、238页。
- ⑥⑪⑫⑮ 沃尔夫冈·本茨:《1945年以来的德国》(Wolfgang Benz, Deutschland seit 1945, Entwickl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und in der DDR),慕尼黑1990年德文版,第78、234、242—243、243页。
- ⑫⑰ 埃里希·昂纳克:《我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中译版,第335—336、365页。
- ⑱⑲⑳ 亨利·阿斯赫比·图尔纳尔:《1945年以来的两个德国历史》(Henry Ashby Turner, Geschichte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seit 1945),慕尼黑1989年德文版,第203、220、217页。